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李柏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李柏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第二语言习得”是指对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过程的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和提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在国内外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在写作过程中,本书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打破外语习得研究与汉语习得研究的隔阂,将国内外语教学研究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进展加以通盘考察,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在语言运用方面,本书在坚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表述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语言习得通论/李柏令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13-10213-3

I. ①第… II. ①李… III. ①第二语言—研究 IV. ①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2311 号

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李柏令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97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213-3/H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前 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简称“二语习得研究”),是指对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过程的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对于探索语言的本质和提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945年,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弗里斯(Charles Fries)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方法应用于语言教学。1953年,美国语言学家乌尔里希·怀恩来希(Ulrich Weinreich)出版《语言接触》(*Language in Contact*)一书,提供了一个对比分析概念框架,提出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干扰”(interference)这一命题。195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专著《跨文化语言学——语言教师的应用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全面系统地提出对比分析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皮特·科德(Pit Corder)和美国心理语言学家莱利·塞林克(Larry Selinker)等人提出的中介语理论为标志,二语习得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蓬勃发展,相关理论不断更新,日趋成熟,研究方法日趋科学和多样化,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论著林林总总。但是,至今尚未系统涉及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这无疑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二语习得研究的一大缺憾。

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历时约3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由英语教学研究界引进、评介和探讨西方的外语教学法和二语习得的基本理论,引进和评介的多为70年代中后期的英美名家的论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二阶段,研究的对象开始从外语教学法(客体)逐渐过渡到学习者(主体),着重探讨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学习环境等;同时,研究者不是一味地引进和吸收西方的外语习得理论和方法,而是结合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实际情况,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反思西方有关的外语习得理论。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对西方的二语习得基本理论开始全面系统地加以引进和消化吸收,而且对于其他语种(如德语等)习得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引进;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观念和策略以及认知、文化差异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外语教学与西方二语习得理论的

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或应用方面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论文和实验报告,还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文集、专著和教材(参见李炯英《回顾 20 世纪中国二语习得研究》,《国外外语教学》2002 年第 2 期)。

相较英语习得的研究,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研究起步更要稍晚一些。1984 年,鲁健骥发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 年第 3 期)一文,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引进了中介语理论,标志着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开端。此后近 30 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也应运而生,并得到空前快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现有的这些成果,都为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当前的研究现状也表现出若干缺陷:

其一,这些研究是由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分头进行,前者主要以国内学生的英语习得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主要以来华汉语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双方各做各的研究,呈现出“两张皮”的隔绝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导致双方都比较缺乏综观整个二语习得研究的宏观视野,也无法从宏观的角度形成相应的研究方法论。于是,当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界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或假说时,却很少看到国内学者提出什么令世人眼前一亮的核理论、新观点。正如李炯英(2002,同上)所指出的:“在二语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无论从语言学、认知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外部语言环境、学习者个体差异、外语教学法等方面,我国学者却没有提出过被广为接受的任何理论或假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施家炜在《国内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二十年》(《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1 期)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更谈不上建立某种完整的、有影响的理论体系——适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模型。”

其二,不少冠名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论著(或教材)其实只是(或主要是)以英语习得为对象,根本不(或较少)涉及汉语习得,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二语习得研究通论”。例如,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王立非《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与实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吴旭东《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林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王栋《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沈昌洪等《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

相较而言,一些以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倒是很少简单冠

以“第二语言习得”之名,而是点出“汉语习得”这一具体对象。例如,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对外汉语教学视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李坤珊《留学生在华汉语教育初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温晓虹《汉语作为外语的习得研究——理论基础与课堂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崔希亮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认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等。

同样,一些冠名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学术团体或者学术会议也是以英语习得为主要对象,兼及俄语、日语等其他外语习得。例如,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二语习得研究学术团体——“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会”,其正式名称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就其参与者和学术交流的内容来看,这只是一个以英语习得研究为主的外语习得研究团体,并不包含汉语习得。

于是,人们就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在国内存在着两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一种就叫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一种却叫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从学科名称上来看,两者本来应该形成上下位关系,而实际上只是平行关系。

顾名思义,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本来应该涵盖所有作为二语的语言习得。在这个学科领域内,可以包括英语二语习得、汉语二语习得、德语二语习得、法语二语习得等平行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以二语习得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反过来又为完善和充实二语习得的一般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研究领域都是整个二语习得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其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一当十”,以偏概全。

其三,现有的研究,其理论基础往往停留于较为传统的视角,而对于近20年来国外开始流行的一些最新研究视角,则尚未引起注意,导致相关研究很难获得新的突破。例如,1993年,国际著名二语习得研究专家维维安·库克(Vivian Cook)在《语言学与第二语言习得》(*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 Martin's Press, 199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一书中评论当时国际二语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时说:“以(乔姆斯基的)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几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他本人也在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the P & P framework)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多元语言能力”(multi-competence)假说,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最终成效”(ultimate attainment)问题。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多语现象的动态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 DMM)、“共同底层概念库”假说(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 CUCB)、“表征的重述模型”(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Model, the RR model)、“分析/控制模型”

(Analysis/Control Model, the A/C model)等理论模型,并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但遗憾的是,对这些理论和假说,目前国内的文献鲜有提及,有的甚至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开展相关研究和实验。

毋庸讳言,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整体上落后于国外至少 20 年。为了学科的加速发展,我们需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应该是我国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共同的心愿和责任。

就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问题,施家炜(2006,同上)指出:“国内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历史较短,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国外二语习得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是,全世界的二语习得领域不会听到中国的声音。有谁会去注意一个追随者呢?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世界注意我们——建构我们自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模型。这同时也是为整个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他还呼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不能仅作为世界二语习得理论的检验者,更应该成为世界二语习得理论的补充者、完善者,甚至建构者。”

诚哉斯言!我们认为,这一呼吁不仅适用于我国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外语习得研究,乃至整个的中国二语习得研究。

针对目前所存在的缺陷,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下列几个问题:

其一,需要打破国内汉、外教学研究界“两张皮”的隔绝状态。换言之,在让“全世界的二语习得领域”“听到中国的声音”之前,我们国内至少要互相听到“自己人”的声音。

一般而言,外语教学研究界普遍不了解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情况。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由于汉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发展滞后,所得成果令人有点“看不上眼”;二则可能是由于外语教学界满足于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验证国外的各种理论,缺乏看待二语习得研究的宏观视野。例如,李炯英(2002,同上)的《回顾 20 世纪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一文,尽管名头很大,又是“20 世纪”,又是“中国”,而文中所回顾的基本上都是英语教学和习得研究。在总结中国二语习得研究情况时,好不容易冒出一句:“当然,这一情况还可以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反映出来,如王建勤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紧接着却又笔锋一转:“但由于这一点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故不在此赘述。”呜呼!好似让人听了一段相声表演中的“大喘气”。而在最新的一篇《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十年回顾:2001—2010》(陈晖,《海外英语》2011 年第 15 期)中,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则干脆一字也不提了。

相比较而言,汉语教学研究界对外语界的研究情况可能了解得更多一点。由于外语水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一般较少直接接触、利用国

外的原版文献,他们对于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外语工作者用中文发表的文献,因而所得到的往往都是“二手货”。于是就形成了国内外语习得研究滞后于国外语言习得研究,而国内汉语习得研究又滞后于国内外语习得研究的状态。

当然,两大研究界各自专注于本领域的研究,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双方总是满足于狭隘的研究视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那么,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就很难真正发现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只能总是跟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手掌心”。而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如果仅就汉语习得而研究汉语习得,还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模型”(施家炜,2006,同上),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了。即使能弄出个把“模型”来,弄出点“响动”来,假如不能为某种普遍规律作贡献,还不知人家想不想“听”呢。

因此,我们认为,两大研究界应当携起手来,知己知彼,共同探讨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语习得研究,为世界二语习得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前应该大力提倡两大研究界的“跨界”研究,即外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积极参与汉语习得研究、利用汉语习得研究成果,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积极参与外语习得研究、利用外语习得研究成果,这样,“井水”与“河水”互相“犯一犯”,兴许能从“浑水”中“摸”到几条“鱼”。另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还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直接利用国外原版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少用“二手货”。同时,相关出版社除了大力引进外文原版著作外,还应重视译著的出版,以扩大国外重要论著的读者面。

其二,需要为二语习得研究“正名”。当然,“正名”不等于“改名”,不是要求人们不再使用“二语习得研究”这个总名,而是要“循名责实”,做到“名副其实”。

把“英语二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等同起来,可谓其来有自。上文已经提到,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是由英语教学研究界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引进的。因而,从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内容和宗旨来看,从其创立伊始,就具有了“英语性”。而且,从名称上来讲,西方也确实往往把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简单地称为“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于是,国内在引进时,也照样翻译为“第二语言习得”。

不过,西方的用法也是事出有因的。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大致是从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起步的,主要是针对英美国家的外来移民(包括留学生)。而开创了二语习得研究的那些先驱和领军人物,也几乎都是英美语言学家。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被‘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所支配。为研究工作提供数据的高级英语学习者是来到英语国家的移民,英语知识对于他们的成功和融入新的社会至关重要。因此,这种知识的发展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劳斐尔, B. Laufer, The influence of L2 on the L1 collocational knowledge and on L1 lexical diversity in free written expression. In Cook, V. (ed.) *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3)。因此,至少在研究的初期,“二语习得”就是“英语二语习得”。

当然,任何一种普遍理论的形成,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亦即先在少量“个别”的基础上假设“一般”,然后用这个“一般”不断检验新的“个别”,从而修正、完善这个“一般”。人们通常并不需要先把所有“个别”全部研究完毕,才总结出无懈可击的“一般”。因此,在英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国家针对其国内的其他重要二语的习得研究也早已蓬勃开展起来,如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俄语的二语习得研究,等等。因此,西方二语习得研究的涵盖面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广义性。不过,就目前而言,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仍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尚未系统地涵盖汉语二语习得。因此,缺了这么一大块的“SLA”,依然是名不副实的。

在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尚未形成之前,国内研究界引进“SLA”(二语习得)这个名称,模仿西方的用法,作为英语等外语习得的代名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发展了近30年以后,人们就不应该再对身边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而继续将遗漏了汉语二语习得这一重要领域的二语习得研究动辄冠之以“二语习得”或者“中国二语习得”。

因此,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就面临着“正名”的问题。孔子有一句名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不“正名”,就容易使人们不断受到“二语习得”就是“英语(或外语)习得”这样的心理暗示,继续深陷这样一个认识误区而不能自拔,从而缺乏创新的动力。

上文提到,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尚未系统地涵盖汉语二语习得,因而留下一个缺陷。而这又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限于语言障碍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西方的学者较少能够利用我国的中文文献,较难了解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亦即难以“听到中国的声音”。在他们国内,尽管“汉语热”正在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人数持续增长,正在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汉语教学的规模仍然很小,与其他作为目的语的大语种尚不可同日而语。再者,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战场永远是在中国。因而,他们要想弥补这个缺陷也难。

然而,这恰恰又是我国学者弥补这个缺陷而实现理论突破的最好机遇。而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途径,就是上文所提出的打破“两张皮”的隔绝状态。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名”而充“实”，真正能够实现“正名”。而“正名”的意义，不仅限于国内，而且面向世界。

其三，需要密切关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新动态。从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者不断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这是因为二语习得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解释，需要运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每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和假说，就意味着对现行理论和假说的补充和更新，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我们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么首先是“赶”，然后才有可能“超”。因此，对于国外的新理论、新假说，我们应当及时引进，加以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从而为这些理论和假说提出补充和完善的变式，甚至受此启发而建构出新颖的理论和假说。

按理说，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自开创 30 多年来，一直在引进、吸收国外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并用之于实践。然而奇怪的是，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Cook, 1993, 同上)，却未见国内有人多加关注，进而积极“入流”。尤其是对于“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等假说，却少见相关评介和研究。

徐烈炯《中国语言学在十字路口》(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在评论乔姆斯基(Chomsky)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时指出，当今世界语言学界没有任何其他学派比乔姆斯基的学说影响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语言学家中追随功能学派的大大多于接受生成学派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功能主义当然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人为什么厚此薄彼？”为此，徐烈炯曾询问过功能语法代表人物之一韩礼德(Halliday)这一问题，韩的回答是，中国的功能语法学家主要是外语教师，而且他本人本来也是语言教师，他的理论比较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

由此看来，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至今不“入流”，大概也是由于在乔姆斯基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二语习得理论流派不那么“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吧！换言之，基于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目的是为外语教学服务这一传统认识，既然要为外语教学服务，那么忽略“反向迁移”等现象，即二语对一语的影响，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诚然，二语习得研究确实是从外语教学法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上文也提到，弗利斯(Fries)于 1945 年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教学，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萌芽。其后兴起的中介语研究，也是旨在找到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天然路线”(natural route)，以便据此为课堂二语教学内容的呈现设计一个合理的次序，以提高二语学习的成效。同样，我国引进二语习得理论，也是因为其“植根于外语教学”(王初明《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序》，载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然而,从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它早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课堂教学之外的自然习得,以及影响二语习得的众多内外部因素,以便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为了直接用于指导二语课堂教学。

在二语习得研究的初创期,即“对比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可以说就是为了指导教学。在它的发展期,即“偏误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已经转变为描写学习者语言的特征。而在它的成熟期,其研究目的则倾向于把二语习得放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宏观框架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解释其本质。由此看来,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从初创到成熟,伴随而来的是与语言教学渐行渐远。因而,科德(Corder)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二语习得研究更关注的是学习过程,与语言教学已经呈现出了分离的趋势(Corder, P. *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6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重心不再是教学法,而是学习者特征及其在习得过程中的作用”(秦晓晴《第二语言习得中认知方式研究的现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第2期)。当然,与语言教学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从此不再为教学服务,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的解释。

同样,人们也越来越关心二语学习中的“最终成效”问题。在这个方面,库克(Cook)所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概念,可能是目前较有解释力的假说之一。因为它已经超越二语习得本身来看二语习得,更强调把“二语学习者”看作“二语使用者”,并关注他们“在一个心灵(mind)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为单向的“迁移”或“影响”。根据这种假说,二语使用者有可能正在建构一个既不同于其母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又不同于其目的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的第三种“复合式”语言能力,即“多元语言能力”。这个概念与“中介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中介语”仅指以目的语规范为衡量标准的第二语言知识。那么,如果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就将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二语学习者/使用者的二语能力和总体语言能力。

就我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外语教学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英语的普及和“过热”,大学生汉语水平的普遍“下降”,一些国人已经持续发出“英语六级,汉语一级”这样的指责,要求“像保卫黄河那样保卫母语”、要求母语免遭英语“污染”的声浪也一波接一波地袭来。这些攻击的矛头固然是指向国家外语政策的,但那些一生致力于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英语教师自然也难辞其“咎”。而且,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已经提示: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母语的“反向迁移”也越严重。那么,如何评价这种“反向迁移”,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

“反向迁移”，或者是否有可能以及有必要避免“反向迁移”，等等，就成为摆在二语习得研究者面前绕不过去的课题了。

那么，如果我们的外语教师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旦国家外语政策有变，导致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外语学习的良好环境受到重创自不待言，而“植根于外语教学”的二语习得研究，就成了“无根之木”，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当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暂时还感受不到同样的压力，因为即使外国学生的母语发生了“反向迁移”（已有少量研究也证明确实存在），那么自然由人家本国政府去管，犯不着我们“瞎操心”，说不定还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辉煌成就”呢。因此，只要全球“汉语热”能够持续升温，总有我们的一碗饭吃——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息息相关、互相支撑的。说得简单点，如果中国人不再热衷于学英语了，就意味着国门重又关上了，那汉语教师还拿什么去维持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仅靠汉语汉文化本身的“魅力”就足够了吗？

因而，即使仅仅是为了“教学”，我们也不能对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置若罔闻，采取“鸵鸟政策”，而是需要所有的二语习得研究者共同努力，加以理论上的解答，以实现我国二语习得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语言大国，也是一个语言学习的大国。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融合而成，而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二语学习的过程。汉语也是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果，而语言融合的必经之路就是二语学习。直到今天，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语教育大国，而且拥有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目的语——汉语。按理说，我们拥有最丰富的二语习得研究资源，最有条件引领世界二语习得研究的潮流。

事实上，早在 23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位伟大的学者关注过二语习得问题，他就是“孔孟之道”的二号人物——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孟子所讲的“一傅众咻”故事。孟子通过“楚大夫之子学齐语”的“案例”（即“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比喻强调了环境对君王向善的至关重要性。而这个比喻，就涉及了二语习得的学习环境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那位“楚大夫之子”在课堂上“学习”二语，尽管有条件请个“一对一”的“外教”（tutored），即使每天抽着鞭子逼他，也还是学不会；反之，如果让他在齐人的里巷之中住上几年，没人教他（untutored），他却自然而然地“习得”齐语了。这就意味着，语言是在二语环境（second language environment）中“习得”（acquired）的，不是在外语环境（foreign language environment）中“学得”（learned）的。这与克拉申（S. Krashen）的“习得—

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也与“交际能力理论”(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暗合。

看来,孟子他老人家早就对二语习得过程作了一番类似“观察式”(empirical)的“研究”,留下了这么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案例”,只是这一思想火花淹没在他的儒家思想的灿烂光辉之中,而未得到发扬光大。对这一类观察到的现象,此后的2000多年中也未见有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实在是可惜了。当然,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一言难尽,此不赘述。

然而,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孟子的时代,而是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时代。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我们确实有责任、有条件走出一条引领世界潮流的路子。这应该是我国所有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出于以上的考虑,我撰写了这本《第二语言习得通论》。本书在国内外二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首先简要梳理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概貌,然后就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二语语用能力习得、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等重点和热点课题分别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探讨。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的理论假说和研究结果。同时,本书努力打破外语习得研究与汉语习得研究的隔阂,将国内外语教学研究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进展加以通盘考察,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在语言运用方面,本书在坚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表述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雅俗共赏。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2004年,至今已有近10年之久。本书的最初形态是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第二语言习得”的讲稿,此后不断进行修改充实,日趋成熟,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2008年,本书申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特色研究项目”基金,获得立项。2010年7月,在本书内容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研究课题《英汉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申请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得立项(项目编号:10BYY025)。同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冯勤编辑和任雅君编辑的鼓励下,本书申请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基金,获得立项。在本书申请立项的过程中,先后获得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卫乃兴教授、国际教育学院凌德祥教授等专家的指点和推荐。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曾给予各种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说	1
1.1 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	2
1.2 二语习得研究的研究内容	8
1.3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流派	28
1.4 二语习得研究的特点和方法	44
第二章 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	53
2.1 母语习得的主要理论	54
2.2 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异同	65
2.3 对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的理论解释	70
2.4 中国国内的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研究	83
第三章 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	88
3.1 语言学能	89
3.2 认知风格	100
3.3 学习策略	116
第四章 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	129
4.1 学习动机	130
4.2 学习者个性	163
第五章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	188
5.1 语言能力与交际语言能力	189
5.2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研究的发展	192

第六章 反向迁移和多元能力	210
6.1 跨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和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211
6.2 多元能力研究	216
6.3 中国国内的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	229

第一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说

有一个笑话说:一天,猫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在散步,遭遇一只狗的吠叫挑衅。猫妈妈就对着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结果把狗吓走了。猫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你们看,学会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

学会一门外语确实很重要。粤语中有一句俗语,叫“鸡同鸭讲”,形容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无法用语言来交流。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就不得不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了,这就是第二语言学习。

第二语言学习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汉语有一个成语,叫做“一傅众咻”,意思是:一人教导而众人吵闹干扰,比喻社会环境对于人们做事的成败影响甚大。这个典故来自《孟子》^①。在这段记述中,孟子为了阐明环境对君王向善的至关重要性,就打了个比方: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要他的儿子学说齐语,最理想的当然是聘请一位齐人而不是楚人来教,然而这又是没用的。因为只有一个齐人教他说齐语,周围却成天有一群楚人围着他说楚语,那么,即使每天抽着鞭子要他说齐语,也是徒劳无功的。反之,假如把他送到齐人聚居的里巷之中住上几年,到那时,且不说他的一口齐语已经说得很流利,即使每天抽着鞭子要他说楚语,也不行了。

我们知道,孟子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是一个善用比喻的语言大师。这一回,他同样运用了比喻,却居然编了个第二语言学习的“案例”。这就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语言学习就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了。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学会一门以上的第二语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二语学习具有地理上的局部性,一般发生在边境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人们的经济来往中,以及较大规模的征服所引起的民族融合进程中,那么在如今的“地球村”时代,二语学习已经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一个人能操不止一种语言,已经成为人类语言生活的常态,而不再是“不寻常”之事。据研究,目前世界人口的50%以上操不止一种语言(Cook, 1992; Kecskes & Papp, 2000)。“在

①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 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 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操几种语言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正常要求:可能在家里操一种以上,在村子里操另一种,为了做生意而又操一种,并且为了与更广大的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外部世界联系还操一种。”(Wardhaugh, 2000)

然而,第二语言学习却又是一件常常令人头疼的事情。当人们一本正经地想要学会一门第二语言时,最常感到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也未必理想。这就促使古往今来的人们始终不渝地对它进行思考和研究。进入当代社会以来,一种专门的科学研究终于诞生了,这就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诞生的初衷,是为了给语言教师提供改善教学的思路。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该学科的重心已转向了对二语习得本质的研究,以探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本质。

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做一个概述。然后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其后各章中分别展开详细讨论。

1.1 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

1.1.1 “第二语言习得”的定义

“第二语言习得”,简称“二语习得”。这一术语译自英语“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L2 acquisition”。“第二语言习得”指人们逐步提高其第二语言能力的过程(process),而对这一过程的研究(study),就称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or the study of SLA)。

在英语中,首字母未大写的“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有时也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科名称,因此就有了分别表示“研究学科”和“研究对象”的两个义项。

在汉语中,不加“研究”二字的“第二语言习得”(“二语习得”)有时也用来兼指这一“研究”,因此也可以分别表示“研究学科”和“研究对象”两个义项。

1.1.2 “第二语言习得”的顾名思义

我们知道,与“第二语言习得”这个名称相近似的,还有“第二语言学习”、“第二语言获得”、“外语习得”、“外语学习”、“母语习得”等。为了避免混淆,我们需要顾名思义,先讨论几组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首先是关于“第二语言”(简称“二语”),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二语”与“第一语言”(简称“一语”)是什么关系,“一语”和“母语”是什么关系,“二语”和“外国语”(简称“外语”)是什么关系,以及“二语”和“目的语”是什么关系。